

罗盘、更路簿、在出海生产作业中打捞起的各个朝代的瓷器……一件件裹满了岁月痕迹的器物、文物和文物标本，整齐地摆放在主席台下的长条桌上，讲述着海南渔民耕海的故事，更承载了潭门渔民沉甸甸的家国情怀。

11月15日，“南海之约：讲述南海渔民自己的故事”——国家南海博物馆潭门渔民文物捐赠仪式在琼海市潭门镇政府举行。

潭门小镇的

文/海南日报记者 许春媚 杜颖 赵优
通讯员 莫泽盈

832件，海南琼海潭门渔民无偿向国家南海博物馆捐赠了珍藏多年的“宝贝”。“这些都是从我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知道国家南海博物馆需要这些东西之后，我们一家人觉得这些东西还是放在博物馆比较好，这样才有意义。”潭门渔民王玉龙这次捐出了203件文物和文物标本，其中明代瓷片标本185件。这些潭门渔民的“宝贝”，将被放置于国家南海博物馆专门设置的展示南海渔民生产、生活的区域内，向人们展现海南渔民开拓南海的历史传统与文化底蕴。

“每一件进入渔民展示专区的藏品背后，都是一段源远流长的耕海故事。”国家南海博物馆筹建办主任陈江说，这些珍贵的“蓝色记忆”如今正被潭门渔民代代传承。

器物中的“闯海记忆”

《加勒比海盗》里的杰克船长靠着一个神奇的罗盘便可以纵横在广阔的海洋之中，闯入许许多多神秘的海洋禁地。潭门，这个南海之滨的小镇上，同样也有着能依靠一个罗盘和一本《更路簿》闯大海的船长。

一个圆形的深褐色的木质盒子，揭开盖子后，围绕着黑色的指针，周边的黑底O形木质底座上，刻写着壬亥乾戌等天干地支24个白色字样。这是一个已经传承了上百年的罗盘，它的“老搭档”是同样摆放在长条桌的用毛笔抄写的一本《更路簿》。“几百年前我们潭门渔民就是靠着这两样装备起航闯南海的。”潭门老船长卢家炳说，驾船时，船长会用罗盘按照《更路簿》上记载的角度方位，让罗盘所对应的角度对准子午线，让船按照这个角度行驶，到达下一个岛礁后，再按照《更路簿》记载的角度更换行船方向，再行驶到下一个岛礁。如此连接下去，整个南海就顺利地绕一个圈，航行完毕。三圈、猫注、黄山马峙、鸟



琼海市潭门镇渔民捐赠的南宋铜饰件。



琼海市潭门镇16位渔民捐赠的400余件家传物件，还原了古代南海渔民的生活状态和海上贸易实况。



南宋酱釉瓷碗。本版图片均由海南日报记者 宋国强 摄

仔峙、
罗孔……
浸染了年月痕

迹的《更路簿》上，
留存下的一个个用海南方言命名的岛礁的名字，是海南渔民代代耕耘南海的历史记忆与见证。

大民

间窑址出产的器具。此外，还有来自东南亚和欧洲地区的物件。

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物件，是怎样来到潭门渔民手中的？卢家炳说，有一部分是以前渔民在南海上生产作业时打捞到的，一部分是渔民在南海一些岛礁上捡到的，还有一些是祖辈行船到东南亚各国时用渔获以物易物换来的。

“由此可见，从古代起，整个中国海都是一条非常繁忙的海上交通线，海上丝绸之路就是一条商路，海南是这条航路上重要的停靠点之一，才会有这么多的货品遗留下来。”南海博物馆筹建办业务组组长张建平说，渔民们捐赠的文物和文物标本，是中西经贸与文化交流的见证。

据史料记载，自汉代以来，海上丝绸之路航道屡有变化，但海南岛始终扼航道之要冲。唐宋时期，商船从广州启运，途经海南岛，经南海到波斯湾、红海，经航东南亚、南亚、西亚，远达东非、北非和地中海沿岸国家。

“这件明代青黄釉划龙纹五铺首缸，听说出水时里面装着各式的瓷器胭脂盒，应该是当时货主用来保护各种小件瓷制品的。”谢海山对

渔民们捐赠的部分物件的年代、用途做了初步鉴定。

在渔民们捐赠的文物和文物标本中，有些物件专家将来龙去脉摸得一清二楚，但有些器物，就连专家也无法断言其用途，比如一件漏斗形的中间有三个圆形小孔的白色小瓷器物件。“有些渔民说这是香插，有些说这是咖啡漏，说法不一。究竟这是什么，目前还有待考证。”张建平说，“渔民们捐赠的东西有着比较厚重的历史文化感，对于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民间贸易交流很有价值，将其集中起来做一个展览意义特别重大。”



11月9日，广东省文物鉴定站文物鉴定专家谢海山在鉴定潭门渔民捐赠的物件。这是一件清代红斑纹青釉瓷碗。



一只民国时期的瓷碗。



民国时期外来的咖啡杯。



一只残缺的清末民初青花碗。

老船长卢裕永：传家宝讲述『南海故事』

文/海南日报记者 赵优 许春媚 杜颖 通讯员 莫泽盈

洁白的瓷盘周边，印有两圈精美的花纹，一如波浪，一如连绵的电影胶片。这个看似普通的瓷盘，是53岁的潭门渔民卢裕永捐赠给国家南海博物馆的两件器物之一，是他传家的宝贝，“这是奶奶保存下来的，据说这是当年爷爷出海捕鱼时，跟着渔船到南洋后用鱼获换回来的。”

经广东知名文物鉴定专家谢海山初步鉴定，瓷盘生产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

这是一个写满了“南海故事”的瓷盘，“它从南洋来，说明以前我们潭门人在海上已经冒险开通了南洋的国际贸易市场。”卢裕永家，也是一个有着满满耕海故事的渔民家庭，“我们卢家四代人，代代闯海，这片大海为我们提供生计，也给我们卢家留下了伤心的故事。”

祖上世代出海谋生的卢裕永，其祖父卢家万不幸于1948年在南沙生产作业的过程中遭遇海难，永远留在南沙；大伯卢传民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船长，1952年不幸在西沙晋卿岛附近遇难，尸骨至今仍埋葬在晋卿岛上。卢裕永的哥哥卢裕洪，常年在南沙从事生产作业，在1996年跟随船长许声文的渔船04243开往南沙的过程中遭遇台风，全船18名船员全部葬身海底。“从我记事起，我就对祖孙三代经历的无情海难铭心刻骨，这给我的家族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但是做为一个潭门的渔民，闯荡南海是一种宿命，也是一种勇气。”

卢裕永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远航南沙的情形：“整整3天3夜，我们的渔船才顺利到达渚碧礁。那一次我下海潜水，收获不少。”那时海上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基本上没有蔬菜，吃的主要是捕捞上来的海产品，淡水很少，经常用海水洗澡，但是再辛苦也得坚持，因为我们潭门渔民的经济来源就来自这片海。”经过多年的磨炼，让卢裕永从一个涉世未深的小水手成长为一名船长，多年的南海生产作业让他积累了丰富的航海经验。

“爷爷留下来的瓷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我们卢家闯海史的见证，现在国家建设南海博物馆，我要把这个见证着当年潭门渔民闯海历史和海南繁荣的海上贸易的物件捐给博物馆，发挥出它的更大作用。”卢裕永说。

在闯海30多年后，现如今的卢裕永选择了退休，“现在我的儿子还经常出海，家族世代在南海作业的传统依然保留。”尽管不再闯海，卢裕永的心却仍在那片蔚蓝之上，“我现在是琼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舞鱼灯代表队的领队。”卢裕永说，“舞鱼灯是潭门流传数千年的最传统的渔民文化，就像给海南博物馆捐家传的瓷盘讲述海南渔民开拓南海的故事一样，我希望通过代表队的努力，将舞鱼灯这个潭门渔民的‘南海故事’告诉更多的人知道。”

人们说，潭门的渔民都长着一张海里的脸。见到58岁的王春吉时，我们才理解了这句话：虽然已多年没有出海，但脸上的皱纹依然深刻，那是在广袤南海上被日光印下的、被风浪划过的脸庞。

潭门镇昌文村、灶坡村、草塘村、富港街的10余户渔民无偿捐赠了825件珍贵文物，文物类型涵盖陶器、瓷器、琉璃、金属、杂项、石器等。灯光下的每一件文物都镌刻着岁月的痕迹，折射着岁月的沧桑。

这批文物中，最大的一件是潭门渔民林光明捐赠的青黄釉大缸，专家鉴定为“明代青黄釉划龙纹五铺首缸”，大缸口径26厘米，被圈裹着一块一块的珊瑚结晶体，底径23厘米，通高50厘米。

这是林光明1978年前收回的一口大缸。据发现这口大缸的渔民说，从华光礁捞上来时，这口缸里还装着各式瓷器胭脂盒。“应该是做外贸交易的商船触礁沉没了。”林光明推断。这背后，也深藏着商人和渔民的生活故事：船上装载着各式各样等待去南洋交易的瓷器，人们干脆将粉盒、香盒等精美易碎的物件仔细堆放在这口大缸里，即节省了空间，又保证了瓷器的安全。

从一件文物，就可窥见当年的生活和文化。林光明爱上收藏，大抵也是如此原因。

像众多潭门人一样，林光明的祖辈辈辈靠耕海为生。他们乘风破浪，以拓荒者的气概，绕过暗礁，战胜急流，行船千里石塘，扬帆万里长堤。

17岁时，林光明就跟随镇上的老渔民出海，慢慢从船工做起。“出过海，才知道潭门人的辛苦。”林光明说，13年的“做海”生涯中，他也曾经历九死一生。在东沙海域附近，渔船遭遇台风，所幸在岛礁避风才得以幸存。“被困船上已经算幸运，毕竟活着回来了。”林光明说。

从小就爱艺术的林光明尤其喜爱镇上渔民出海时带回来的各式物件。渔民在岛礁作业时，常常会意外捞到水下的海捞瓷残片以及各类文物。林光明常常仔细把玩研究，慢慢地爱上了收藏，哪怕再小的残片都用心留着。

此次国家南海博物馆征集文物，林光明毫不犹豫地捐赠109件文物，其中元代瓷片标本33件。“南海博物馆能落在潭门，我们非常高兴、荣幸。”虽然已经不出海，但林光明的骨子里依然流淌着渔民的血脉。把这么多年收藏积攒下的物件捐赠出来，林光明并没有不舍。“希望子孙后代看到这些物件，能够感受到潭门和南海的历史。”他说。

在林光明看来，每一件文物都有它背后的故事。他捐赠的文物多数出自宋、元、明时期，大都为青花瓷。他能从一个个物件中，感知着潭门人在祖宗海上的故事与传奇。

人们说，潭门的渔民都长着一张海里的脸。

见到58岁的王春吉时，我们才理解了这句话：虽然已多年没有出海，但脸上的皱纹依然深刻，那是在广袤南海上被日光印下的、被风浪划过的脸庞。

潭门内港旁，国家南海博物馆正在建设中，潭门本地渔民向博物馆捐赠了832件文物，其中王春吉捐赠了97件，其中50多件为南宋文物。“这些宝贝留在家里对我们没有什么意义，放在博物馆对国家更有意义。”王春吉明白，这是让更多人了解潭门历史文化以及渔民世代深耕南海的好时机。

王春吉兄弟四个，他最小。像哥俩一样，王春吉18岁就开始“做海”。上世纪70年代，王春吉开的还是没有动力的帆船，“十几吨的船在大海上就像一片小树叶。”他还记得，当初没有通讯设备，飘在海上的渔船无法和岸上联系，一出海就杳无音讯，家人只能日复一日地等待，祈祷他们平安归来。

后来，靠风力行驶的帆船逐渐变成30吨的机械动力渔船，但“做海”的辛苦依然难言。

让王春吉引以为傲的，是潭门人独特的捕捞方式——传统的礁盘作业。渔船开到礁盘外围，便放下小艇，渔民就带上自制的简易护目镜下潜到礁盘，捕获石斑、苏眉、龙虾等经济价值高的生猛海鲜。

这时，渔民才和沉睡在水底的文物产生了交集。

据王春吉推断，沉船大都因触礁或遭遇风浪而沉没，渔民们被夺去生命，船上的物品也葬身在海底。“有的渔民作业时捡到沉船的文物，觉得不吉利，就会丢在海里。”王春吉说，许多渔民并不是很懂得这些文物的价值。

渔民捡到的文物，大都是各个年代的瓷碗、瓷盘、瓷杯等，而发现这些瓷器时，它们大都一摞一摞地躺在水底，数量又多又集中。“这说明这些瓷器是外贸交易用的，我们国家很早就与外国做生意做买卖，南海是必经之路。”王春吉总会仔细端详这些宝贝，和收藏爱好者研究瓷器的年代，现在也已能粗略分辨瓷器出自官窑还是民窑。王春吉告诉记者，官窑瓷器底部一般有落款，如“大明成化年制”等字样，而民窑瓷器大都做出口用，也是潭门渔民收藏得最多的。

“这些文物都是有力的证据，证明我们祖祖辈辈都在南海作业、航行。”王春吉知道南海对于潭门渔民的意义，更知道潭门渔民犁波耕海的苦。

听说国家南海博物馆将设“南海渔民”展区，王春吉很是期待，“国家这么重视，我们渔民当然尽力支持，希望会有更多人能够通过这些物件了解这段历史和文化。”